

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

——
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

宋庆森 著

中国方正出版社

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

——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

宋庆森 著

中国方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脚本佳人 奈何做贼：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/宋庆森著. —北京：中国方正出版社，2010.7

ISBN 978 - 7 - 80216 - 638 - 7

I. ①脚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廉政建设 - 研究 - 中国 IV. ①D63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1650 号

脚本佳人 奈何做贼

——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

宋庆森 著

责任编辑：康 弘
责任校对：张 蓉
责任印制：李 华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方正出版社
(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1号 邮编：100813)
发行部：(010)66560950 门市部：(010)66562733
编辑部：(010)59596607 出版部：(010)66510958
网 址：www.FZPress.com.cn
责编 E-mail：taoying8701@163.com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印 刷：北京春华腾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：14
字 数：172 千字
版 次：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ISBN 978 - 7 - 80216 - 638 - 7

定价：28.0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)

曾几何时，反腐败研究成了一门显学，北大、清华、浙大、社科院等都设立了研究机构。反腐专家的著作，也出版了不少，今后还会更多。我这本小书，是在工作中收集的相关资料，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，掺和在一起而写成的，不系统，不严谨，难称正论。

如果说有什么“创新”，那么，可以说是一锅“乱炖”，就是把荤的素的，十七八样菜一锅煮，这是北方人的叫法，上海人雅一些，把它称为“什落羹”。作这样的比喻，意思是说，这盘菜只是一个大杂烩，既不新鲜，也没什么地道的口味。

腐败，古已有之。埃及、希腊、罗马，独裁政权、民主政权，封建主义经济、资本主义经济、社会主义经济，基督教文化、伊斯兰文化、佛教文化、印度教文化，无一例外，全都经历了腐败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今日的中国，稍微留意一下报纸电视，就可以看到，刚刚宣称某某是某省某市某行业“第一贪”，过不了一年半载，这“第一贪”就易主了。有道是：“贪官时有猛人出，各占版面没几天”，像刘青山、张子善那样独占“贪坛”几十年的状况，恐怕难以重现了。

人们将腐败比喻为“政治之癌”，有一定的道理。20世纪60年代，美国在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同时，另一项庞大计划也启动，就是攻克癌症，希望在不长时间内攻克这个当今对人类威胁最大的疾病。最后的结果是前者顺利完

成，后者计划泡汤，至今未见大效，每年死于癌症的患者以千万计。人们总是希望发明一种特效药，能一下子扼杀住癌病魔，就像当年发明了雷敏风药，一下子治住了肺结核病一样。现在看来，我们把这个问题看简单了，发明一种特效治癌药可能性很小。在目前条件下，对付癌症最好的办法就是力争早发现，发现以后最好的办法就是综合治疗。只要病人身体许可，手术、化疗、放疗、中医、基因疗法一起上，就像治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一样。全国各地正在试验的各种各样的方法，都可能有效，但想搞出一种像雷敏风治肺结核一样的药，短时间还不行，因为癌症的成因太复杂。腐败也一样，它是沿着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前进的，各方的力都在起作用。它的成因也很复杂，同样，对腐败我们现在也拿不出一招制胜之法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采取鸡尾酒疗法，各种方法一齐上。我的这本小书就是按这一思路写的，所以说是一锅“乱炖”。

“卿本佳人，奈何做贼”，或作“卿本佳人，奈何为贼”，意思是原是好人的，后来变坏了，此语有多种出处。《隋书·韦鼎传》中韦鼎对一个土豪劣绅说：“卿是好人，那忽作贼？”；《三国演义》九十三回“姜伯约归降孔明，武乡侯骂死王朗”，诸葛亮阵前骂王朗，“你原本是个好好人，却反助逆贼，成了坏人，我看你即日就该死。”王朗气满胸膛，一下子撞死于马下；后来，也有人用这句话指骂汪精卫、周作人等人。“贪官如贼”，原有这样的说法，再，贪官原本多是“佳人”，变成了“贼”，怒其、哀其、恨其，以此语冠书名，颇逞一时之快。

宋庆森

2010年7月

目 录 <<<

上 篇

- 第一章 “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” / 3
- 第二章 信仰断裂 / 27
- 第三章 物欲的诱惑 / 37
- 第四章 人性的弱点 / 47
- 第五章 色戒 / 61
- 第六章 浮世绘 / 70
- 第七章 贪官累 / 83
- 第八章 要对腐败零容忍 / 103

下 篇

- 第九章 皇帝如何反贪 / 119
- 第十章 漫谈清官 / 138
- 第十一章 编织权力栅栏 / 152
- 第十二章 不可轻视的“外力” / 167
- 第十三章 官薪与腐败 / 185
- 第十四章 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教育官员 / 203

上篇

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——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

郭沫若的不少论著和史学观点曾引起学界争论，比如扬李（白）抑杜（甫）、古史分期、《胡笳十八拍》的版权等，包括名声很大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。自1944年郭氏写此书到现在，又一个甲申年过去了，在中国共产党党内，或用做于“干部必读”，或列为党校教材，久行不辍，对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也争论不断。不光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大家熟悉，当年国民党也组织文人对这本书进行过口诛笔伐。在中国近代史上，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，也是不多的。

毛泽东盛赞郭老此书，并以之作为延安干部整风的读物，其意当鉴于李自成大军入京后所犯错误，以告诫全党不可忘乎所以，这和他重视黄炎培向他提醒的一句警句：“其兴也勃，其亡也忽”，亦是同理，只不过郭文更具形象罢了。今天，《甲申三百年祭》一书，还是反腐败研究中被大家经常引用的经典。

我对郭文也颇喜欢，经常翻看。文中这样一段文字颇有意思，这是郭文转引的资料，源于《剿闯小史》：

伪军师宋矮子同制将军李岩私步出长安门外，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，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，呵道经过。

岩谓宋曰：“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？”

宋曰：“彼等纱帽原是陋品，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辈也。”

岩曰：“明朝选士，由乡试而会试，由会试而廷试，然后观政候选，可谓严格之至矣。何以国家有事，报效之人不多见也？”

宋曰：“明朝国政，误在重科制，循资格。是以国破君亡，鲜见忠义。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？一旦君父有难，皆各思自保。其新进者盖曰：‘我功名实非容易，二十年灯窗辛苦，才博得一纱帽上头。一事未成。焉有即死之理？’此科制之不得人也。而旧任老臣又曰：‘我官居极品，亦非容易。二十年仕途小心，方得此地位，大臣非只我一人，我即独死无益。’此资格不得人也。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，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。无怪其弃旧事新，而不相关也。”

其时，李自成大军刚刚入北京城。大将刘宗敏在吴宅搞绑票，逼得吴三桂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。“丞相”牛金星“大轿门棍，洒金扇上贴内阁字，玉带蓝袍圆领，往来拜客，遍请同乡”，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。

宋献策（引文中的宋矮子）、李岩是李自成队伍中头脑比较清醒的。战火还没熄灭，已经在思考后人所说的“赶考”问题了。

纱帽（官员）本来是政权的维护者，满朝公卿谁不享受朝廷高爵厚禄，怎么国家有事不为之效力，反而争先恐后地举起白旗呢。不要说对旧主子的感恩，连起码的人情也不顾，崇祯上吊时，只有一个太监在身边。满朝文武都到哪里去了，不但不救驾，“旧臣选伪

职者皆锦衣跨马，呵道经过”。先主尸骨未寒，都已争先恐后人新朝拜新主了。

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？原因很多。宋献策认为，误在重科举制，循资格。这里涉及了官员选拔制度和官员质量的关系。宋认为，中国的科举制出不了良吏，只能出劣官、出贪官。

二

一百多年前，具体说来是 1905 年，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重大事件。这一年的 9 月 2 日（阴历八月初四），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等六疆臣给清廷上了道奏折，奏请立停科举，推广学堂。清廷诏准自丙午（1906 年）科为始，所有乡、会试亦即停止。袁世凯是旧式人物，一脑瓜子封建迷信，此时的清廷更是腐朽的像座快要塌了的破庙，怎么会如此大胆创新，把中国千年的老例给改了，动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根基，这在现在看来也是大气魄、大手笔。其实，当时这样做是时代潮流使然，大势所趋，是当政者不得不做的事。不过，制度是废了，可是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这延续了 1300 年的封建社会头号制度，是耶非耶，至今还争论不休。2005 年，恰逢废除科举制一百年，学界曾有一次集中的争论。争论的一致结论当然是没有的，在众说纷纭中有一点倒是大家认可的，那就是科举制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，而且是一种政治制度，一种选官的制度设计。这种制度必然与官场体制、官场政治联系在一起，也与中国官场中的历史通病——腐败密不可分。

中国的科举制创立于隋。隋前的魏晋时期，还是一个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门第观念很深的社会。那时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，在各州郡选择“贤有识见”者的官员任“中正”。中正以家世、

道德、才能为标准查访评定人才，将他们分为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、中中、中下、下上、下中、下下九等，作为朝廷用人的依据。这种用人制度最大的弊病是讲门第，即“血统论”。选用人时，家世是第一位的。魏晋后期，随着社会发展，中下层的中小地主成为一股新兴力量，他们有了政治诉求，希望走上政治舞台。统治者从巩固政权角度考虑，也试图淡化社会等级界限，改革用人办法。隋开皇七年（公元587年），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，规定采用考试方法选择官吏，科举制诞生了。“昔日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平民通往权力中枢的路开通了，科举制使穷酸书生，在一夜间翻身成为了可能。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于连的野心在欧洲贵族国家只是欲望，在我们这儿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了。

科举之妙，如唐太宗所言，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”。唐太宗站在城楼上，看考生鱼贯而进入考场，捋着胡子，高兴地说出了这句名言。科举制的施行，实现了对士人阶层，并由士人阶层扩展到整个社会阶层的有效驾驭。“天下英雄”统统入轨，纳入体制内，别的道路走不通。这是防止知识分子不轨的一个釜底抽薪的好办法，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力大大加强了。

科举制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坚实基础上，迎合了士子的个人奋斗愿望。从表面上看，人人平等，人人都有盼头，赢了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，输了是你自己不努力的结果，怨不得谁。“天下英雄”都赶上了这座独木桥，一方面是挤得大部分都掉下河去，另一方面是没有其他路可走，明知通过这座独木桥的可能性很小，也只能往上挤。你想另辟蹊径，只能成为另类，社会不认可。就像现在单位录用人，正规学历是第一条，你说我没上过大学，但本事很大，谁认可你，人家会问，你本事很大，为什么没考上大学？

从表面上看，科考内容主要是经义，是儒家那一套东西。儒家

讲的是道德，重在“德育”。十年寒窗，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保证良好的品行应该没问题了。可是，事实并非如此，士子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修身，而是功名，为做官，为发财。就像《官场现形记》中方氏家塾的那位先生所说的那样：“中举之后，一路上去，中进士，入翰林，好处多着哩！”“入了翰林就有官做，做了官就有钱赚；还要坐大堂打人；出起门来，开锣喝道。”读书，入考，当官，发财，千百年来，中国人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，士人学子付诸行动，普通民众的脑子里也是认可这条路是正统，其余的路都是旁门左道。

科举制使中国人当官发财的欲望成为可能，反过来，又加深了中国人的当官发财思想。当官发财，天经地义，中国人老说要统一思想，就当官发财这一点来说，最能统一国人思想，不但尽人皆知，而且占据大脑的最深层。1916年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中以犀利笔触写道：

“充满吾人之神经，填塞吾人之骨髓，虽尸解魂消，焚其骨，扬其灰，用显微镜点点验之，皆各有‘做官发财’四大字。做官以张其威，发财以逞其欲。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。人间种种善行，凡不利此目的者，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；人间种种罪恶，凡有利此目的者，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。”

做官发财思想是万恶之源。陈独秀分析认为：“此等卑劣思维，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（孔门即有干禄之学），与夫社会之恶习，相演而日深”，结果是“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，发愤维新之志士，一旦与世周旋，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，无不与日俱深。浊流滔滔，虽有健者，莫之能御”。

“做官发财”这一观念已演化为我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思维定式，成为国民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成为阻碍我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负面心理因素。芸芸众生往往陷入对“做官发财”既痛恨又羨

慕的怪圈——痛恨正在“发财”的贪官污吏，同时又在羡慕中梦想有朝一日，风水轮流转，我也同样发大财。因此，欲塑造现代之国民，必根除这种“做官发财”的传统意识。那么，科举制何以导致升官发财观念？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。

三

从入馆求师到求考，这条唯一通道狭窄又漫长。每三年全国才录300进士，不要说走到顶端，到天子堂去殿试，去争那么几个状元、探花、榜眼，就是考到举人，也是漫漫长夜路，其间需要大量投入。

中国两千多年是宗法家族制度的社会，其突出的特点就是血缘关系处于人际关系的中心。在家、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中，政务、家务的运作均以血缘关系为枢纽。这一特点表现在家族一面，就是家族成员与整个家族的牢固关系。每一个家族都希望自己的家族兴旺，家族兴旺发达的标志就是在科考中有没有人出人头地，有多少人当官，当过多大的官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不要说出了个状元郎，出榜眼、探花，就是出个举人，儿孙几辈子人，七姑八姨都可沾光。这样，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学子在读书赶考，背后却是一个庞大的家族，往往集中了一个家族的经济力量和精神企盼。财力是基础，起码是小康殷实家族才能支撑得起，常常是一个家族多年，甚至几代人的积蓄掷于一个学子身上，一般的农民之家根本负担不起。

别的不说，如果能上京城赶考，仅路费就是一笔大开支。那时的交通不像现在，其间的艰难是今人难以想像的。现在北京到广州，飞机只飞三小时，当年林则徐受命禁烟，从北京到广州整整走了六十一天，那还是坐着马车的，你想想穷书生从南方来一趟京城有多难。

寒窗十年，其苦楚不用说了，过一场考试就得扒一层皮。当时各省考试的地方叫“贡院”，一个贡院少则几千人，多则几万人参考，人文繁盛的江南贡院，到清末时最多号舍有两万多间。贡院设三道门，是进行搜检的通道。贡院四周高墙围住，围墙上布满荆棘，进考场就如关进了监狱。杭州的贡院还三面环河，防范之制甚是严密。每人一个格子笼，“诸生席舍，谓之号房，人一军士”。贡院中建一高楼，叫明远楼，三层楼高。考官居高临下眺望，全考场情况一览无余。清代词人李竺翁曾为明远楼写对联：“距今若霜严，看多士俯伏低徊，群器尽息；襟期同月朗，喜此地江山人物，一览无余。”那恰似现代监狱了，事实上管考生和管犯人是一样的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《王子安》中还有这样的比喻：

“初入时，白足提篮似丐。唱名时，官呵隶骂似囚。其归号舍也，孔孔伸头，房房露脚，似秋末之冷蜂。其出场也，神神懊惶，天地异色，似出笼之病鸟。”

真是“三场辛苦磨成鬼，两字功名误煞人。”一些士子无法忍受乞丐般的科场生活，因此走上绝路。光绪壬寅科浙江乡试，“闻场中考生死者三人。一人死于蛇，一人烛签自刺，一自碎其睾丸。”

身上的苦难还好说，还有磨人的“精神成本”。

明朝归有光有一篇著名的散文《项脊轩志》，描写自己当年寒舍苦读的情景。字里行间，流露出浓浓的亲情，读来催人泪下，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，亲人望子成龙的急切心情。

“娘以指扣门扉曰：‘儿寒乎？欲食乎？’”

“一日，大母过余曰：‘吾儿，久不见若影，何竟日默默在

此，大英女郎也?’比去，以手阖门，自语曰：‘吾家读书久不效，儿之成，则可待乎!’顷之，持一象笏至，曰：‘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，他日汝当用之!’”

老祖母已年迈之身，犹念念不忘孙儿他日能够继承祖业和重振家风。母亲慈爱，关怀备至，“以指扣门扉”，生怕惊动了苦读中的儿子。

归有光具才气，可是仕途却很不得意，到35岁才中举，直到花甲之年才当了长兴知县。回想当年，“瞻顾遗迹，如在昨日，令人长号不自禁”。贫士蹭蹬之情，跃然纸上。

日夜苦读，挨过考试，一路战战兢兢，伴随着长久的焦忧，临近发榜，不安的心情，那就活活要把人急死。古书中常有如此的描写：“急迨望报也，草木皆惊，梦想亦幻。”《红楼梦》的续作者高鹗写过一篇《荷叶杯》词：

盼断嫦娥佳信，更尽。小玉忽惊人，门外传来一新纸。真么真？真么真！

传神之笔写尽等待“录取通知书”的惊恐之状。一个家族，像押宝一样，压在一篇三五百字的八股文上，还要加上科场的舞弊、考官的老眼昏花这档子事，如何才能榜上有名，真是令人胆战心惊，难怪范进要发疯。

《儒林外史》写范进中举，那是入了语文教程的：“抱着鸡，手里插个草标，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，在那里寻人卖”，当看到了中举捷报后，“看一遍，又念了一遍，自己两手拍了一下，笑了一声道：‘噫，好了！我中了！’说着往后一跤摔倒，牙关咬紧，不省人事。老太太慌

了，忙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。他爬将起来，又拍着手大笑道：‘噫，好！我中了！’笑着。不由分说往门外飞跑，把报录人和邻居吓了一跳。走出大门不多路，一脚端在塘里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，两手黄泥，淋淋漓漓一身的水，众人拉他不住，拍着、笑着，一直走到集上去了，众人大眼望小眼，一齐道：‘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’”。

科考把人弄得神经兮兮。

四

中举了，甚至参加殿试，点了翰林，通向官场的门敲开了，但是并非立马授职入堂做官，“敲门砖”只是敲开了做官的第一道门，真正圆做官发财的梦还早着呢，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。从制度上来说，所有的文官都要由朝廷吏部铨选，并定期让士子“掣签”（即抽签以定做官的省份）而后分发。因此，凡是要做官的士子必须到京城投供报到。一般说来，凡是到地方上任的，都要按吏部规定的“班次”候选。由于仕途杂进，做官的人多，候选的士子都要“候”一段时间，才能轮到掣签分发。新科进士归班选用知县，直到吏部查明前科进士将次用完，才能令其赴部投供，照原甲第名次先后挨选。

中国古代的官员可以分为两大类：职事官和散官。职事官有固定的编制，担任实际职务并行使一定权力；散官则没有定额，没有实际职务，也就没权力，这还不同于现在的“非领导职务”官员，它只是一种象征，也称阶官。《隋书·百官志》记：“居曹有职务者为职务官，无职务者为散官。”

由于历年累积，再加上“捐官”越来越多，花钱可以买官，于是修补的官员如过江之鲫。比如，清末四川一地，候补道员多至 50 多人，知府 20 多人，通判、知州、知县多达 400 多人，以至于出现